

回憶錄

基督將軍 布衣將軍 反戈將軍
模範軍閥 丘八詩人

①

馮玉祥回憶錄

馮玉祥 著



東方出版社

回憶錄

馮玉祥回憶錄

下

馮玉祥 著



東方出版社

第二卷 我的抗日生活

第二卷 我的抗日生活

第一章 卢沟炮火

一九三七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七月七日，我正住在庐山。在这以前看日本人的情形，就知道要有大规模的侵略动作，尤其是在北方发动。当时的形势，是宋哲元、张自忠、刘汝明、冯治安、赵登禹几位将军，驻守在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察哈尔各地（刘汝明驻察哈尔、张自忠驻天津、冯治安驻保定、宋哲元驻北平）。日本人看着这一部分军队，就如同眼中钉一样。因为他们全军的将士，都情愿死也不愿意把一点权利让给日本人。这样，一方面要侵略，一方面要抵抗，当然非打起来不可。

在将打未打的时候，这几位将军外面体谅国家的困难，对日本人表面敷衍，而内里是加紧爱国抗日的精神教育，充实军队的力量，秘密地购买了许多新式武器。全军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买了很多子弹，这没有别的，就是为了准备跟日本人死拼。

谁都知道的，抗战的炮火第一声是响在吉星文团长驻守的卢沟桥。卢沟桥筑在无定河上。无定河可以说是很古的一道河，它的源头是在山西地区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拖沙带石，汹涌澎湃，忽南忽北，滚来滚去，河身无定。到清朝的时候，才给它起个名字，叫永定河。流至宛平县，上边筑这一道桥，宽大坚固，这是通往南方许多省的一条要道。桥的建筑，雄伟壮丽，俗语说“卢沟桥上狮子数不清”，即言其多的意思。桥北头有一座城，那是专为守桥的军队和地方官吏预备的，后来，就变成收税的地方了。卢沟桥南岸不很远就是长辛店，东边不很远就是丰台，西边就是潭柘寺，可见这个地方形势之重要了。这一天，日本人就在这个地方挑起了衅端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些官兵不待命令就敢对抗起来。一方面是宋、张、冯、刘、赵等将领平素爱国教育的认真贯彻；另一方面，就是吉星文团长有血性，有良心，有决心，硬骨头，说干就干，他不顾一切，真的对日本鬼子拼起死命来啦。

“七七”战事一发生，我即从庐山返回南京。宋哲元请梁式堂为他的代表，到南京来向蒋先生报告。梁先生一下车就病了，住在中央饭店。他对我说，他在北平就患痢疾，宋哲元找他来南京，他家里的人说：“不能去，你有病怎么能去呢？”梁先生回答说：“是自己的命要紧啊，还是国家要紧啊？”决定非去不可。到了车上，天气太热，热得没有办法，车顶子都晒烫了，就把车厢窗户全都敞开，

窗户里进来的风也是热的。本来就有很厉害的痢疾病，又加上热风一闷，昼夜不歇，下车就头痛。他把北方的情形对我说了，我马上给他们写了几封信，主要的意思就是对日抗战，非抗到底不可。什么叫“到底”呢？就是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复回来，这就叫“到底”。梁式堂笑着说，他们一定能做得到。

没有几天，梁式堂先生的病转为脑膜炎，就死在中央医院里了。实在可以说，式堂先生不到南京来，他不会死，他为什么来呢？就是为了献身救国，这真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！

北方战起，鹿瑞伯马上到保定，去找宋哲元，找不到，说他回了老家——山东乐陵去了。忽然我又听到说，日本鬼子袭击南苑，用飞机轰炸得很厉害，佟麟阁副军长、赵登禹师长同时阵亡。我听了这个话，判断官兵一定死了很多，我一面痛哭，一面很高兴。哭的是佟麟阁、赵登禹都从十五六岁就跟着我，那些官兵也都是跟着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，他们一旦死了，如何不难过？我一睁眼一闭眼就看见佟、赵在我的眼前；高兴的是他们为国捐躯，忠勇赴义，死有重于泰山。我作了一首白话诗，抄在这里：

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，

赵是二十三年的弟兄。

我们艰苦共尝，

我们患难相从。

论学问：佟入高教团，

用过一年功；

赵入教导团，

八个月后即回营。

论体格：同样强壮，

但赵比佟更伟雄。

佟善练兵，心极细；

赵长杀敌，夜袭营。

佟极俭朴，

而信教甚诚；

赵极孝义，

而尤能笃行；

二人是一样的忠，

二人是一样的勇。

如今同为抗敌阵亡，

使我何等的悲伤！

但我替他们二位想想，
又觉得庆幸非常。
食人民脂膏，
受国家培养，
必须这样的死，
方是良好下场。
后死者奋力抗战，
都奉你们为榜样。
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，
不怕敌焰如何猖狂。
最后胜利必在我方，
最后胜利必在我方！
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，
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。

在军委会里，把这个情形向蒋委员长说明，当日就发表了命令：

“佟麟阁、赵登禹追加上将。”

当天又听说，我的大孩子冯洪国在南苑教导团当大队长，也阵亡了^①。几个报上都这么说，我觉得如真有其事，可算是很好的下场。我也作了一首白话诗：

儿在河北，
父在江南，
抗日救国，
责任一般；
收复失地，
保我主权，
谁先战死，
谁先心安；
牺牲小我，
求民族之大全，
奋勇杀敌，
方是中国儿男。
天职所在，

① 冯洪国实未死，传闻有误。

不可让人占先。

父要慈、子要孝，

都须为国把身捐。

不多几天，听到说，日本鬼子把北平完全占了。有一位团长，叫刘汝珍，是刘汝明的兄弟，我曾送他到苏联留学，学的是修理飞机，回国之后，就跟我当卫队团长。这一次在北平，他看见他们的旅长同日本人勾搭，马上带了他这一个团，冲出北平，一直奔南口跑了。这一旅共有两团人，他这一团跑了，那另一团也跟着他跑了两营多。他们在前头跑，日本人就在后边追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打着，到底日本人也沒打着他们。

为什么一个团长不听旅长的命令？说起这一点来，真是中国特有的文明。从前晋国魏临死以前，有两段话跟他的儿子讲，前一段是说，他若死了，需要把他的爱妾另嫁出去，不要殉葬。后来，他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快要死时，他又说，他的这个爱妾一定要跟他一块死，要殉葬。魏死了之后，他的两个儿子商议说，父亲以前说的话是“治命”，临死的时候说的话是“乱命”，“治命”可从，“乱命”不可从。刘汝珍团长有这种是非之辨，认定他的旅长投降日本，这是“乱命”，不是“治命”，所以不可从，就带着队伍走了。他连年对日打了许多光荣的烈仗，已经升做了军长。

在北平负着责任的人，看到长辛店、丰台都不能走了，他们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走三家店、门头沟、潭柘寺，绕道长辛店以南，才同队伍合到一起，这总算是侥幸的事。

看《列国》上秦孟明氏挂帅来袭击郑国，因为郑国的弦高去西周经商，在街上见前面秦军来袭，就假托君命宰牛，说是来犒劳秦师，孟明氏白乙丙以为郑国知道他们来了，一定早有了准备，不敢向郑国前进，就唏晔而归。《列国志》对于这件事批评说：“大军压境，不知戒备，该袭！”以这桩事来看，就知道日本鬼子驻了很多的兵在平津一带，应该是每一分钟、每十分钟都有发动袭击我们的可能。若以为是他不会这么着，他不会那么着。那就是自取灭亡。幸而有这些爱国的将士，不论成败，不计利害，敢同倭寇拼死命到底。什么叫武器万能？什么叫机械化万能？他一概不懂，而只知道用自己的血肉，拿自己的性命来保卫国土，这种忠勇无比的精神，实在是至高至贵的瑰宝。

廊坊，日本鬼子也来袭击，也是双方互有死伤。天津守军是张自忠将军部刘振三旅长，日本鬼子想要把刘吃掉，但碰到刘的队伍，倭寇却被打死很多。几进几出，前仆后继，不说是尸积如山、血流成河，可一堆一堆死的都是日本人。几天之后，因众寡悬殊，刘旅才退到马厂收容整顿，预备再行抵抗。

平汉路日本人用了三种方法：第一是利用侦探，就是用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

装成中国人，到处活动，侦察我们的秘密。第二，是利用轰炸。河北省秘书长魏兰田先生讲，有一个防空洞里面都是省政府的重要人员，隐藏在里头。有一次飞机投弹正扔在洞顶上，一下子全炸塌了，幸而魏兰田那天没在洞里，不然也就完了。从这件事情看，就知道日本鬼子是利用侦探同飞机轰炸配合起来，坑害我们。魏兰田家里有个防空洞，就侦察得这么清楚，还用说别的东西吗？第三，是用炮火集中攻击我们。我们的炮少，炮弹少，当然打不过他们。以这三件事来说，侦探算是第一件法宝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高贵人之间都有他们的侦探，很贫穷的人里头也有他们很多的侦探。他们用第五纵队来造谣惑众，那真够得上是指白为黑，视无有。难民里头，一面跑一面听到说：“日本人有五万人，在背后追着呢。”又有人说：“还有十万日本人在前面，把桥破坏了。”为什么说这是谣言？那真是天兵天将都不会有这么快。这就是日本人对我们作战使用的最厉害的一种方法。

第二章 淞沪抗战

说着就快到“八一三”了，这一天我们开一个中央政治会议，在陵园^①一个无梁殿里头。什么叫无梁殿呢？就是完全用砖砌起的一个大殿。在这里开会，确定了程颂云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，阎百川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，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。第一战区就是平汉路，第二战区就是晋绥，第三战区就是京沪。在开会的时候，汪兆铭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同他的一位同志，就打算了怎么样坑害主张抗战的人们，怎么样培植主张投降的人们，一言一行都明白地表现出来。

到了十五号，我从南京出发，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。出发以前，我写了一个遗嘱，交给我家里的人，放在我箱子里头。主要的话如下：

“同日本鬼子打仗，是为了雪国耻、收失地，上可以对得住祖先，下可以对得住子孙，成功是成功，失败也是成功。不论到什么时候，我的子孙绝不能同日本鬼子妥协。我有几间房子，都交给李德全就完了。”

出发的时候，参谋长是熊斌代理，刘骥为总参议，后来参谋长换了鹿钟麟。从陵园寓所出发，过了宜兴就遇见日本鬼子的六架飞机，飞得很低，看见飞机上边日本鬼子的太阳徽很真切。当时若是轰炸，那我们马上就完了。看那样子，和后来的证明，知道他是炸陵园和南京去了。我到了苏州张治中的司令部，知道张治中正在前头打仗，并且打得非常激烈。我同他的副官长谈了不过三分钟的话，我说：

“我要到上海附近去看看。”

出了他的司令部，离开苏州也不过五里就听见苏州附近有大的轰炸。后来知道，就是炸了那个司令部的外边和里边。由此可见，日本人在京、沪、苏州一带，布满了间谍侦探。

后来听说，有一户人家在苏州车站附近开了一个茶馆，在楼底下设有无线电台，他在车站附近看见什么情况，听见什么消息，就马上给日本人报告。不多几天，他的一个独子竟在外面被敌机炸死。他的太太骂他：

“你这个人，没有良心，不能得好报应，你看你给日本鬼子报告消息，日本鬼

^① 即南京市中山陵。

子的飞机轰炸，连你的儿子都炸死了，你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呢？”

夫妇俩越吵越厉害，打起来了。他的女人就去告发了，他被地方上的人捉住，问实了才枪决的。苏州出的这样事情，不止二三十起。

日本鬼子想出的害人法子，非常之多，一个是下象棋，一个是下围棋。他完全是为了勾搭中国人，收买中国人，稍一不慎，就被他们诳骗了。他特别注意的就是地方上这些破落户，没有正经职业，而有酸不溜丢的蹲茶馆的能耐，既不会做工，又不会种田，游手好闲，坐吃山空，没有别的办法，最容易被日本人收买。若是真正读书的青年，或是工人，或是农民，日本人也没有法子接近，他也不敢接近。他知道这些青年和真正的老百姓是有良心有血性的，他一说坏话，这些人就去打他，他怎么敢同这些人接近呢？

我到了昆山车站附近，我的一个副官不认识路，急急忙忙地把引路的小汽车开到昆山车站上去了。这是个死葫芦头，汽车路不通上海，又转回来。刚出车站还没有二百步，敌人的十二架飞机就到了，在车站附近俯冲式轰炸，把车站上的队伍炸死了很多人。我是下了汽车在一个破房子里，带几个传令副官站在那房子底下，叫汽车开出去二三百步，借着道边上的树木隐蔽起来。敌人轰炸完了，飞机走了，我出来一看，熊哲民参谋长蹲在稻田里，只露出个脑袋来，幸而没有伤着他。这时的谷子刚刚秀齐，水是很深的。

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先生的司令部，张发奎同志、顾祝同同志、张治中同志、陈诚同志，他们都是总司令，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，另外有杨虎同志，他是上海警备司令。我把在这个司令部里头所见的情形写在下面：

一、很有一种作战的精神，紧张沉着，各司其职。

二、电话、电报十分忙碌，看出战斗的激烈。

三、李印泉先生、张一麐先生、江问渔先生，还有别的几位，从苏州来慰劳军队。他们在大轰炸之下，不顾一切地来慰劳将士，为什么？他们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爱护国家的一种真诚，一种热烈的感情。

四、我们大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，这张相是很宝贵的，值得纪念的。

今天回溯往事，也就想起张一麐老先生一九四三年在嘉陵宾馆聘他的女儿。一九四五年他就死了，这老先生没有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完全投降，真是可惜得很。

李印泉先生前几年在他云南的家乡带着许多家乡子弟，跟日本人拼过多少次的死命，真是老当益壮，越老越坚强，实在不愧是民众的楷模。

江问渔先生住在重庆乡间，吐血很厉害，这实在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教育家。

我记不清，我想黄炎培先生当时也许在场。黄炎培先生这些年来，为抗战，为救国，东奔西走，历尽辛苦，真是到处大声疾呼。胜利之后，他为了民主，为了和平，也努了很大的力。后来还有人去搜查他的家，拿枪对着他家人的胸口，问有枪没有枪，这都是历年以来真诚爱国的人所遭遇的意外的侮辱。最近他到上

海去了，还不知道光景怎么样呢！

在张治中的司令部里，同几位朋友开了会议之后，我就回到苏州西边的一个大庙里。这一路上，敌机时而在前面轰炸，时而又在后面轰炸。到苏州附近，就将要黑天了，遇着敌机十几架低飞扫射。我同周参谋^①几个人下了车伏到一个坟地里，从地上向上看飞机，看不十分清楚，我想他向下看也是看不清楚。

敌机过去之后，不到五分钟，苏州城里就有一阵很大的爆炸声音。

这天晚上，我住在苏州附近山上的大庙里。这个庙里边，情形很特别，还有些个古迹。分别记述如下：

一、客厅非常的大，能坐几十桌客人。

二、挂单的和尚也很多，可怜得很。

三、三更半夜里就起来打坐念经，看那一碗饭真不容易吃。

四、我想已经开始抗战，这般人都是我们的同胞，也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。为什么不用他们去抵抗敌人？为什么不用他们去做生产事业？为什么叫他们在这里坐吃山空？

五、我觉得这是革命政府的耻辱，也表现了我们社会的落后。

六、有人说吴王夫差原来的宫殿就在那院子西边里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和尚不慌不忙的，如数家珍一样，说出多少古迹来，我听他的话，有一半是真的，有一半是假的。

次日一早，敌人的飞机就到庙顶上，转了一个圈走了，我们用过早饭就到上海去，看汽车路上，各种车辆太多了，军队也很多，把这路堵塞得喘不过气来，大家都不能通过，费了很大的气力，才到了前方。

上海的战场，在一百里以外看着，半边天都是红的，远远地听见炮声昼夜不停。敌人企图先把上海给打开，因为他们扬言三个星期要把中国打投降了。又说，最多用不了三个月。所以才集中力量海陆空齐进，对着上海全力攻击。我们也是尽力地把所有能打的队伍都调了来，一师一师的，一军一军的，简直是用最大的力量拼死命。

有一天晚上，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要到前方来开个会议。这天午后九点钟，我们在距张治中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开会（看那光景也不过四里）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来了。先是大家报告敌人的情形，后是决定怎么个打法。当时报告最详细和陈述意见最有意思的，就是张治中先生。他主张抄袭敌人的背后，从敌人的腰里头截击，我很赞同他这话。后来，蒋先生又详细地指示了一番，就散了。蒋先生坐汽车到苏州，在一个旅馆里停了一下，不到十分钟就上了火车回南京去了。火车刚开，敌人的飞机来了，把旅馆马上炸平。可见敌人的间谍在苏州

^① 即周茂藩。

是如何之多。

有一天，我在无锡梅园的一个地方住着，倭寇的飞机来了，就在那太湖里头扔了炸弹，把鱼炸死了好几百条。我有一首《二百条鱼》的白话诗，记述着这件事。

又有一天，敌机把太湖边上的一个大桥作为目标轰炸起来了。那周围五里路，连一家人家也没有，它跟发了疯一样，冲着那里轰炸起来，岂不是活见鬼了吗？这样劳民伤财，不但不能威吓我们的同胞，却使我们更加仇视日本鬼子。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、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，有的一师人加上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，有的支持了五个钟头，就死了三分之二。有许多人说，这个战场就是个大熔炉，填进去就熔化了。

空军比着日本的数目相差很远，可是我们忠勇无比的空军将士们，也把日本鬼子打得不轻。不过数目相差太远，有的将领们打电话要飞机，他们不知道，哪里还有飞机呀！他们再三再四地要，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没有，只得说等着吧，过一会儿飞机就来了。可怜哪！我们前线的官兵，被敌人的飞机用机关枪扫射得抬不起头来，而我们的飞机又被敌人毁坏了十分之九，全面抗战，哪里不要飞机呢！哪里有那么多的飞机呢！

到今天，我们痛定思痛，觉得太危险了，自己不能制造飞机，简直就是如同徒手跟猛虎搏斗一样。现在有很多人说建国建军，我看最要紧的还是建机器，建工厂。如果我们建立起来大量的电气工厂，大量的机器工厂，大量地提炼铝、铀……那么，飞机能自己造，汽车能自己造，不但能造，而且能多造，当然没人敢欺侮我们。若是有人欺侮我们，他必定要吃很大的苦头。空口说建国建军，那是没用的。

昆山有一位曹亚伯先生，他随从孙总理革命很多年，总理最看得起他，也最信服他，他是我的很好的朋友。我一到昆山就去找他，他是黑天白日都在努力抗战工作。为了抗战，有时他一天都吃不上饭，并且是万分热诚而有义气。有一次，夜间一点钟，我到了他那里，他领我到跟前一个山上去，那里有个大塔，并且有几间房子，他说：

“不轰炸的时候，可以在这房子里办事，轰炸的时候，就在塔底下。”

我说：“当司令长官还能见了敌人的飞机来了藏藏躲躲吗？那不太笑话了？”

他说：“不对，司令长官不叫敌人伤着，这才是真正为国的司令长官，也就是真正爱护官兵的司令长官。若是随随便便叫敌人炸伤了，或是炸死了，那能算是拥护政府吗？那能算是爱护官兵吗？”

我觉得他这话很对。曹亚伯先生是“武昌革命日知会”的发起人，武昌起义可以说曹先生出过很大力的，他是创建中华民国的一位革命英雄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最好的模范人物。又有一天夜间，我同白健生先生一路去看曹亚伯先生，他马上给我们预备好了地方，让我们在一个屋里讨论事情，他在外边警戒着，这种情形太难得了。过了没几个月，上海沦陷了，昆山也沦陷了，曹先生得了病与世

长辞了。这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，把我们宝贵无比的曹亚伯先生给害死了，真是可惜到万分！

在昆山，有一天夜间两点钟去看陈诚，他正在那里伏在桌子上研究地图，我同他谈了一会儿前方作战的事情。我知道陈先生到了深夜还在那里苦心研究，真是一位抗战的好将军。他能吃苦耐劳，能实干，敢说话，不怕得罪人，这是他最大的长处，有些人故意跟他为难，我觉得不大妥当。我常常说几句公道话，也有人不痛快，我是不管哪个，应当说的我还是说。

日本的间谍布置到各处。有一天夜间十一点多钟，敌人的飞机来到昆山附近，马上就有人放红灯，一个一个地起来了，当然敌人轰炸很容易。像这一类的事他们布置得很多，把我们的人坑害得很厉害。

上海到苏州的一条公路，一运起兵来，觉得太窄了。军队行军占去了一半，一辆汽车又占去一半，对面再来一辆汽车，这就没办法了。若是对面再来一部分军队，那就挤成酱了，这还说的是步兵行军。若是炮车呢，就挤在一起，谁也不要走了。交通在各方面都关系很大，对于军事来说那简直是重要到万分。挤在那里过不去，差五分钟都不得了，何况是几个钟头过不去呢。特别困难的是路上没有交通警察，没有人指挥，这样一来，彼此在那里对峙，谁也不让谁，敌人的飞机来了，很厉害地轰炸，就这样死的人很多。

有一天，蒋先生给我一个电报说，据夏楚中报告，他有一营人守宝山，全营覆没，所有的官兵都为国牺牲了。这个消息，我向将领们说了之后，人人都很悲痛，各个都愿意效法他们，为国家尽忠，为民族尽孝。真的，此一壮烈的事迹，鼓励士气很大。可见人生世上，都是互相影响的。

在作战的时候，伤兵伤官很不好往下运，运到苏州、无锡，各地临时医院里也有。

伤兵是吃了大亏，一个是事前没有预备那么些医务人才，还有一个是没有预备那么些药品，再一个是交通太不便，担架队太少，运不下来。有一次，有个伤兵到了医院门口，大哭大骂，哭骂完了就死了。那是因为他路上流血太多，没有水喝，没有人照护，他觉得还不如死在前方好。又有一次，几个受伤的连长，运到南京火车站，也是大声地骂起来，说：“你们把我枪决了好！”这都是流血太多，没有包扎，太痛苦的缘故。

到了医院的人，本来地方上的父老绅士们，各界的同胞们，都愿意有点表示，送些礼物和钱，可是有些特务人员夹杂在医院里，不准人们去看，不准人们送东西，就这样一闹，弄得大家莫名其妙，只好不闻不问了。这样冷淡下来，伤兵们受苦，士气也吃亏很大。

前方打仗的军队，指挥的权限不一，最高统帅，连一连炮兵他都指挥着。电话是通的，一会儿叫这个，一会儿叫那个。因此，有些官长躲在后方，手里拿着

电话，一叫他就在，问他在哪里，他说我在最前线上什么地方，其实不然，他在离开战线很远的地方，就单抱着个电话机等着打电话呢！狡猾的是这样，不狡猾的在前方死拼，叫不到他，这实在是大可研究的事。

说到炮兵、工兵，临时拨归某部队指挥，平时并不归他统辖，这样一来，人生面不熟，彼此不相了解，叫他把炮队在什么地方进入阵地，他就自己打起如意算盘来了。有一次，一个炮兵连长对我说，他那一连是四门炮，叫他进入阵地，他就拉一门炮上去了，其余的留一门在后方，而把另两门炮藏到后方很远的地方。我问他：

“你为什么这样办？”

他说：“我看前方的光景不好。不久要退却的时候，指挥官的队伍说走就走了，我这炮要退多艰难啊，他到时若不给我信，那就更糟了。”

这些炮兵的官长，都存着这种心理，前方的炮火威力怎样能增大呢？若是这个制度不改革，恐怕将来还有很大的乱子。

军队里头吃饭是一件大事，“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就心慌”。俗语说得好，“人是官的，肚子不是官的”。这是说非吃饭不可。我们事前对于携带干粮毫无准备，饼干没有，罐头没有，那就不要说了，就连面包也没有的。吃什么东西呢？还是吃大米饭。怎么做法？散兵线后头，近了不能做，远了做好送到前方全都凉了，凉饭一吃就病。今天的飞机，敌人全是低飞，除了轰炸就是用机关枪扫射，他看见你哪里一冒烟他就轰炸，哪里一冒火他就来扫射，伙夫没有办法做饭，若打死几个那就更没办法了。实在说起来，前头的队伍，连官带兵，有一多半是饿得不能打仗，并不是敌人多么厉害。我确实知道，官兵们吃饭的事到如今还没有办法，为什么呢？有些人，他们就不愿意注重这类根本问题，完全是自己骗自己，怎么会不糟糕呢？

说到运输问题，以连为单位来说，谁担子弹，谁送饭，谁送粮秣，谁送伤兵，每连上哪几个兵，除一除这个，除一除那个，七折八扣，剩了很少很少的在前头打仗。为什么这样办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注重性命根本的大事。

看看吧，拉炮的骡子和驮机关枪的骡马，真是骨瘦如柴，那可以说是“窈窕淑骡”了，它还能拉炮？它还能驮机关枪？它走路都走不动！为什么这个样子？因为炮兵直属军政部，军长、师长、旅长都管不着他，而军政部又有那么多的事，他怎么照顾得了呢？因此，骡马的事就糟得不成个东西了。骡马是军中的活动武器，克扣骡马的麸料，就像损坏枪炮一样。他们会说，不会去看；他们会坐在屋里等报告，不敢去实地考察。还有一个病根，他们不敢切切实实地惩办哪一个不好的，奖赏哪一个好的，不论什么事，得马虎就马虎了，有什么事情不坏到底呢？

军队本是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地方，不能有什么特务在里头，但哪晓得，也是有特务的。他奉的命令是专作报告，这样一来，他没有报告就不能领津贴，逼

得他就无枝而添叶地来干，小报告一天几个，弄得很麻烦。好在我是满不在乎，我的遗嘱是写好了的，我就是要死在敌人手里，日本鬼子要打死我，我一定要收复失地，至于旁的，你报告什么不报告什么，我全不在乎。

有一天，新买了两辆摩托车，一个叫李正义的，他骑着到宜兴那边一个山洞里去，到宜兴拐弯没拐好，摔了个半死，就送入医院了。本来他是在交辘学校学的，谁晓得他一大意便出了一个大岔子。若不是摔坏了他，我还不知道。

有一个姓孙的，山东人，在英国读过书，看他那个样子，就是不紧不慢的，不拿着事情当事情。有一天夜间十二点，我在无锡那个湖边上住着，忽听到飞机轰炸声，我马上就叫姓孙的去看，并且叫他去打听打听百姓，谁晓得他马马虎虎，一直到了午后三点也没报告，他真是拿着事情不当事情。后来他跟着鹿瑞伯先生到河北去了，弄得怎么样，不大清楚。鹿先生当兵役部长的时候，我看见他跟着鹿部长，不久就听到说，他因为贪污下了监狱，定了十年还是八年的监禁。可见自己看不起自己，拿着事情不当事情，不真正负责任，不听人的话，是自己害了自己。未下监禁以前，他从英国留学回来，我没看见他拿过书，不但英文不看，中文也不看，一个人不看书，不自己教育自己，管自己。怎么能进步呢？

第三章 津浦前线

有一天白健生来对我说，宋哲元的队伍退到了马厂，蒋先生叫他跟我商量，问我到河北去，指挥他这一路的队伍好不好。我说：“在抗战的时候，只有唯命是听，统帅有什么命令，我都是遵从。”

后来，我接到命令，调我到第六战区去。那是很紧急的时候，我马上乘汽车到南京，见了蒋先生，我说：“为了打仗，到哪里去都可以。只是有一句话，王聘卿^①和段芝泉^②他们两人是好朋友。王当国务总理，段接他的事，当中必须有一个人接替一会儿，他才能接。况且，宋哲元是我的旧部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接他的事，若命我指挥他几天，倒无不可，这是我预先要声明的。”

蒋先生很以为然。我预备了火车，马上就走。日本鬼子散布侦探间谍太多了，我由浦口开车，出去不过四站，鹿瑞伯的车子在后方还没开车，当中有一列车，铁路坏了，车也歪倒了，可见日本鬼子是怎样暗中对付我了。我很高兴，日本人总算看得起我，他能这么用工夫对付我。去蚌埠一路上都是轰炸，日本人的飞机，不在前便在后，用机关枪扫射。走到两下店，这个车站上树木很多，很茂盛，我把车停在这里，跟着我的人都下车出去离开铁路几里路。日本的飞机来往轰炸，把从南边新来的车炸坏了，我这个车呢？到底没有炸着，就是沾了树林子茂盛的好处。

到了济南府，我对韩复榘说：

“你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听政府的命令，对日本人作战就是最正大最光明的道路，千万不可听坏人的话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张自忠来见我，在车站上，韩复榘说：

“求先生为张自忠写一封信给蒋先生。”

我说：“很好，你们的事要我帮忙，凡我能做的，我都愿意做。”

我马上给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，主要是说赦免人的罪过到多少次，圣经上说，七十个七次。

我坐火车到了景县的桑园，下了车，知道前头的军队在马厂打着，并且打得很激烈。这就调后边的队伍，来了一支原系东北的队伍，是姓刘的带着，对他们

① 王士珍，字聘卿。

② 段祺瑞，字芝泉。

的将领勉励了几句，就开上前方去了。还有几部归我指挥的东北的队伍，用无线电找怎么也叫不应他们，命令发不下去，多么令人着急呀！我这几年都没有管军事，万想不到这救国救民的军事坏到这步田地！这是谁的责任？一天到晚都是糊弄，“李铁拐，把眼挤，你哄我，我哄你”。这叫什么国家大事！有些身为将领的，一天到晚打麻将，完全是赌博鬼，要想用他，就送他钱，十万、二十万随便送，以为这就是办法。到了真正有事了，除了几个有良心的以外，跑的跑了，溜的溜了，藏的藏了，哪一个也不肯出力真干，像这样子怎么能救国家呢！

千言万语，军事是最科学最实在的东西，不能有一点欺哄骗人。现在看一看，半点实在也没有，可怕不可怕？有一天，冯治安、陈继淹同一个姓肖^①的来见我，言谈之下，姓肖的说政府对不起他们，我马上把脸沉下来，对他们说：

“政府现在抗日，无论是谁，不能再说政府不对。”

我又切实地重复了一次，并且又特别地对冯治安叮嘱一番，我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不能有一点受人挑拨，说政府的不对。”

冯治安非常领略这话，说一定切实遵守。

冯治安是河北省主席兼师长，他跟我当过伙夫，也是我的模范连的学生，很勇敢，很坚强，并且对人很谦和。陈继淹是河北人，自从一九二一年（民国十年）由陕西督军署来跟着我，在南苑入了军官高级教导团，后来入了陆军大学。他人很聪明，很知道是非，对于抗战很努力。姓肖的是东北人，完全是政客，有官有钱他卖国都干。中央有许多人被他骗了。他常说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同他谈个半点钟的话，无论你有多大本事，他都可以拿着你当泥球儿一样玩。他说起话来，可以叫人爹，可以叫人爷，可以叫人祖宗，什么好听他说什么。可是他脚直动，你问他那是怎么的？他说脚直动就是说“不算，不算”。遇见这样的人，你不倒霉说什么！同这种人打伙计，没有不失败的，同这种人做生意买卖，也一定要失败。他在重庆用汽油有人供给，用车有人供给，这两位先生都是政府的人，也闹了好几年，才晓得是被他骗了。中国的俗话说：“不知其人，观其友。”你这家里老有个卖国贼跑出跑进，别人怎么看呢？后来他做了个大买卖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坑了，这还不可以证明吗？秦绍文对一个人说，又有人告诉我，肖与雷继尚飞香港与日本贺知商量，何^②要广田三原则^③所说的一切，肖两面来回说逛头。别人问他，他说：

① 指肖振瀛。

② 即何应钦。

③ “广田三原则”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“对华三原则”，即：一、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；二、树立中日“满”经济合作；三、中日共同防共。